

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

尤 西 林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12世纪诞生于基督教母体的大学,使精神教化与知识传授获得统一,并为现代社会奠定了知识与意义统一的教育机制。大学作为创新科学原理与守护精神价值的策源地,特别以造就人格化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知识分子执著于科学原理与道义根据渊源于大学的终极信仰传统,此即人文精神。大学对主体认知、意志与情感的素质教育,最深层的素质乃是对真善美终极价值的执著向往,大学人文精神从而成为对古典信仰教化的现代性转化与承担。

关键词:大学;人文精神;信仰;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2)02-0001-05

The origin of faith in humanity in universities

YOU Xi-l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university in the 12th century from Christianity, which aimed at educating people and imparting knowledge, was a historical step towards modernity, and at a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that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with sense. The university, in which scientific principle is made and spiritual values are worshiped, is the place where intellectuals with good moral integrity are trained and brought up.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 and the spiritual values sought by the intellectuals originated from the tradition of the ultimate faith, that is, the humanity in modern times. In the qualities of subject cognition, will and emotion fostered through humanity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the highest and the most essential is the fascination in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Therefore, the humanity in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 transition and commitment of modernity of the classical faith fostering.

Key words: university; humanity; faith; modernity

—

近现代意义的大学,自12世纪初诞生至今,撇开诸多外在形态的改变,就其最为根本的精神宗旨所规定的大势而言,可以区分为两大演变阶段:以

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立为分水岭,此前的大学基本以基督教神学修道院为原型而向世俗化方向演变,此后的大学则愈渐定位于民族国家精神文化与科技所需求的教育和科研。

中古大学不仅脱胎于基督教会,而且不管如何

收稿日期:2001-11-20

作者简介:尤西林(1947—),男,四川成都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人文科学原理、美学与信仰论研究。

趋于世俗化,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团体,特别是一个普世的基督教精神世界,始终是大学的实质性依托。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世俗化迄至18世纪也未能提供一种取代基督教世界的依托体。这一情况随着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近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观念而根本转变。正是承续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在普法战争惨败时刻,德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自我意识被有力激发,这直接推动了洪堡上书申请创办柏林大学(1809)。

柏林大学的成立,与汲取战败教训、强盛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背景密切相关。柏林大学为此后的大学开创了一个深远的转变方向,那就是,将科学研究视为与传统教学并重的职能。这一方向固然可激活教学传统而成为现代大学重要的特性,但以研究为方向却成为大学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特别是转化为商业经济的纽带。这一纽带对于大学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大学回应社会以激发活力的途径,又包含有使大学隶属于现代化技术进程,从而丧失大学现代性批判位置的危险。海德格尔后来从后一角度反思了它更为深远的危害:“研究者必然自发地涌向根本意义上的技术人员的本质形态的范围中……除此之外,还有某些时间和某些地方,能够保持着变得越来越淡薄和空洞的学究和大学的罗曼蒂克。但是,大学的有效的统一特性,以及大学的现实性,却不在于科学的原始统一过程所具有的某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发源于大学,因为它得到大学的培育,并且在大学中得到了保存。”^[1]

海德格尔在此反思中把现代性思维典范的科学归源于大学。但是,大学这种涵摄并超越现代性的本源地位又起源于何处呢?

这是有关大学本质的根本问题。与现代关于大学(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毕业生就业去向等亟迫重大而具体应对的现实性问题相比,关于大学本质的超反思形成了另一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思考兴起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的19世纪,这同时是从思想观念到社会运动空前激烈地批判现代化——现代性的时期。关于大学本性的思考成为现代性批判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一关于大学本性的现代性反思不断强调的关键词有:渊源于柏拉图的“理念”(idea)及其近现代演化概念“理想”(idea)、“精神”(德文“Geist”)、“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围绕这些关键词产生了“大学”思想的一系列著作:英国纽曼(J. H. C. Newman)大主教的《大学理念》(The Idea of a U-

niversity, 1852)、美国佛雷克斯纳(A. Flexner)的《大学》(Universities, 1930)、德国雅斯珀斯(K. Jaspers)的《大学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1946)、美国克尔(C. Kerr)的《大学功能》(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1963)、德国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大学理念》(1986)、美国彼里坎(J. Pelikan)的《大学理念:一个回顾》(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 1992)……在中国,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1925)、《大学教育》(1930)中所阐发的“大学理念”及其北京大学范型,即使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依然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大学思考中享有经典原型地位。而以解构主义名世的法国著名当代哲学家德里达(J. Derrida)关于大学理念的执著思考(从1983年在美国的“大学在今天是否有‘存在之理’?”的专题讲演,到2001年在中国复旦大学接受名誉博士时“关于‘无条件’的大学”的讲演)则表明,大学理念已成为抗衡现代拜金主义与技术主义的重要基石,这是一个即使在后现代消解主义时代也无法消解的理念。

“理念”(idea),这个希腊理性哲学所信仰坚执的真善美的故乡观念,在启蒙之后已转化为人文精神的“理想”观念,关于大学的思考,为什么总要与其相连,并透出一种神圣的信仰意味呢?

二

有必要从区别于历史编纂学与实证社会学的人文信仰发生学角度重新审视大学的诞生。

大学12世纪初诞生于欧洲。与此相关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 近代城市的形成。需注意的是,城市,如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发现的,不能仅仅外在地理因于人类直接觅食藏身与工商贸易的聚合结果,而同时还是起源于祭祀地点的固定化,以及“精神世界”(innerness)保存寄托的需要。这一精神空间实体曾经是教会。但大学诞生之前的10世纪,基督教会已严重地蜕化为最有权势的世俗团体。对于基督教及其教会而言,政教合一使其代表精神世界并引领世俗社会的能力受到严重伤害;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世俗社会而言,王权及新兴资本主义工商业却不只需要从一个世俗权势化的政教合一信仰体的压迫中获得挣脱、解放(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而且也需要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精神信仰空间(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新教改革)。

2. 修道院与经院哲学。从5世纪到12世纪,一方面基督教会愈渐世俗中心化,另一方面自圣·本尼狄克特建立其修道会开始,基督教信仰通过远离世俗幸福的修道院生活磨炼,开始寻找新的精神空间。从6世纪开始,修道院开始办学校,到了9世纪,修道院办学已蔚然成风。修道院学校不仅招收院内学生(Oblati),而且招收俗界走读生(Externi)。就其直接目标而言,修道院办学校是为培养修士,但此种扩张性的办学教育,正属于基督教信仰在政教合一困境下的精神空间开拓或突围。它深远地使基督教信仰将重心移向学校教育。

修道院学校将古典人文学科的“七艺”(特别是辩证法)用于基督教神学,而发展起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将神学与理性结合并留给后来大学的一项珍贵遗产乃是对学术的信仰态度。学术论辩是在相互诘难中共同趋近真理的活动,由于真理在经院哲学中所享有的基督教信仰地位,学术因而成为超出任何特定个人意志的信仰性对象。这就是后来大学中学术享有至高尊严的渊源。

3. 行会与现代性社会功能分化。社会功能的分化及其在社会功能分化意义上相应的社会阶层的分化,是现代性(modernity)基本特性之一。它基于社会有机体功能分化(分工),而非基于世袭与暴力所形成的权力、财富多寡来确定社会阶层。中世纪的行会公会(Universitas)正是现代性分化的社会基础。拉丁文 Universitas 指由一些有知识和技艺的人组成的传授知识、技艺的联合体。行会的社团涵义后来由中古英语的 gild 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 gildi 混合成的英语 guild(基尔特)承担。尽管组成行会的动机与直接的生存利益密切相关,但行会所凝聚强化的近代社会职业意识及其职业文化,却超越了特定阶层的利益格局。其中特别侧重的是本行职业的传授与教育。但这种教育却超越了具体行业技术的传授。各行业普遍需要的知识(当时是法学)、人文学科基础教育与神学信仰,使 Universitas 转化为 Universitates(大学),这就是今日英语的 University(大学)。“Universitates”最初称为“Studium generale”,意即“来自各方的人一起参与学习”,它表明一个超行会的社会公共教育机构的产生。这恰是前述近现代社会职能分化中的定位,它特别是满足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对精神信仰空间的重建需要。

因此,大学一方面同渔贩、商行等行会一样是一种特定的行会团体,它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他们有着自己本行的条件要求与协作利益。但另一方面,大学这一行会的职业内容及其性质却超越了包括大

学师生在内的社会各个行会的特定利益格局与立场。大学承担了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以及文化创造和发展的专门功能。其中,尤其是作为各行业经营活动的涵义(meaning)所具有的终极价值与意义(Significance)^[2],它不能够依据各行业直接的涵义(meaning)自身来确定。阐释意义曾是从巫师到教士的专职。但中世纪政教合一使基督教会沦陷于世俗涵义中已无力维持意义境界,在近代科学已现曙光的历史趋势下,与知识分离的教化也不再正当。于是经由修道院中介,这一承担社会终极价值意义阐释与教化的功能便历史性地传递给了大学。如同巫师身兼神使与人类代言人双重身份而不能拥有私人身份及利益一样^[3],大学行业也成为现代社会终极意义的最高关怀机构。

所谓社会最高代表,在此并非指行政实体的首长,而是指大学行业人士更应超越自身特定利益立场,甚至超越特定阶级、政党与王国、民族利益,从更高的人类社会整体与终极价值意义角度思考行事。这一社会职能的承担者被称作“知识分子”^[4]。Universitates 及其知识分子因而在各行业公会中享有了特殊的地位。拉丁文“un—ns”从此指称着卓越崇高者。

只有从上述深层精神结构与社会职能角度,我们才会更深刻地理解大学在中世纪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第一,大学“首先是个宗教组织。……大学的成员仍全部被当作教士看待,接受教会的管辖,并且更要受罗马教廷领导”^[5]。大学创办人即该城市的主教,校长由大教堂司法官兼任,教师即牧师,学生是教士或在一定程度上被定向为未来的教士^[6]。更准确地讲,大学是世俗化时代的世俗大教堂或一种“知识教会”。

第二,大学的国际性。尽管中世纪行会组织追求的一个方向是跨地域的普遍联系与认同,但只有大学才真正达到了最为普遍的国际性联系。大学教师的讲授与大学学生的听课是跨国界的。大学的国际性直接依托基督教世界的教会组织。但大学普遍性的一体关联与高度认同,更深层依托的是基督教信仰,亦即精神世界的普世性。这深刻标志着大学行会的精神共契性质。

第三,大学高度自治的独立性。大学的自治独立地位,起初是依凭基督教会在中世纪的特殊地位而来。大学与市民、各种行会、王权的冲突磨擦,均以享有修道院式的豁免权而未受制裁。大学这种自治独立性的更高发展,则是在与教会组织的磨擦矛盾中

逐步摆脱控制,而终于成为王权、教会与各种世俗势力不得侵犯的神圣领土。质而言之,大学是世俗化时代一个神圣的独立王国。本文对此的强调是:基督教创办大学,不仅是一桩历史事实,而且是现代精神信仰演进的逻辑环节。在文艺复兴与现代历史行将来临的前夕,基督教将精神信仰教化的资格转交给大学,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现代性开端。教化在大学中与知识结合为一体而获得了现代合法性与正当性。大学从此不仅在基督教与政权分离的近代意义上,而且在独立于政治、经济与大众媒体的现代意义上成为政教分离的现代文明的一个致动因,并构成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一个特殊领域。

三

确如韦伯(M. Weber)著名的概括:现代社会已不再是神性信仰的时代,世界除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化了。与此相应的是以科技与工商为代表的理性化。这样便又返回到本文开始的话题:启蒙运动以降,科技工商主义及其引发的现代化(外在的客观世界)与现代性(内在的心性精神世界)危机,均在深层需要上要求重建规范与引导科技理性的终极信仰。这信仰在19世纪以迥然别异于文艺复兴世俗化人文主义的新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形态出现。它一方面同经过启蒙理性批判洗礼的宗教精神联系,一方面又以现代理性的人文科学与现代复兴的古典人文学科为学术教育基地。这两方面都与大学相关。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自此将中古大学的基督教神学信仰转变为人文精神信仰。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成为现代大学引人注目的话语。这也就是“大学理念”的基本涵义。这人文精神所针对的不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神学,而是现代科技工商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大学与中古大学是一脉相承的。

这就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1998)时,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Neil L. Rudenstine)首先以人文学科教育在大学基础理论研究 with 基础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展开讲题的时代背景^[7]。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大学校长几乎一致地在“21世纪的大学”主题下强调了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教育。这一“大学理念”与以财政为中心的现实问题论域形成了现代大学校长们的两大问题共识。

只有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与把握现代大学的功能与精神。

1. 大学知识及其研修的特性

(1)大学所研修的知识,其主干并非实用的技术规则,而是技术的原理,即“知识的知识”。原理性知识为各类职业技术所倚凭、遵循,但并非其认知与传授的对象(“百姓日用而不知”),惟有大学将各专业技术所根据的原理作为知识研讨并传授为学术传统。这是大学与职业学校,乃至专才学院的根本区别之一。知识体系本身的重要性超过了所研究的特定对象及其应用价值。大学精神之理念在此体现为“为知识而知识”,即“爱智”。此即古希腊最高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a)本性,它在近代以后的科学领域中体现为区别于特定具体科学技术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及技术的原动力。科学精神构成大学精神之一。

(2)大学知识超越实用技术的精神同时体现为对技术分工专业知识的综合整合。“meta”(超、元)“physics”(物理科学)之“metaphysics”汉译名“形而上学”,表明此“学”乃道体(本体)之大学问;而“爱智”之“智”,亦并非仅指近代科学意义的规律认知,而是真善美统一的人生最高智慧。因而,大学知识的整合性不仅指各科分支知识的系统化,而且更是指知识、意志、情感及相应各类学问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系于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由此而指向大学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

大学人文精神的人文价值整合统一性是大学完整统一性的内在保证。大学文理工农医诸专业相隔系科之所以聚于一校而不落于外在空间聚合,端赖此大学精神纽带维系。大学精神因而是超专业的。承载大学人文精神的不仅是大学的专业知识,而且有那代代相传的学术传统风气(重实证或重思想、“兼容并包”的自由学术,等等)与社会个人观念(如“五四”以来北大突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使命感),还有大学社团活动、卓越教授的个人魅力、同学的聚合,乃至那古老的校园建筑与林木古藤……大学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而且是个性化的生命体。“大学校园”成为上述因素的统一体。因而将大学简化为知识传授,就抽去了大学的人文精神而不复为大学。电脑时代的信息网络教育或诸种远程教育的“大学校”(Multiversity)之所以不可能取代大学,根本限定之一亦在于此。

2. 大学知识分子的涵义

大学所培养的本源意义的知识分子,如别尔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所强调,应是以人文关怀为理念的人文知识分子^[8]。这一意义的知识分子特别应注意与技术专家角色区别开来。

(1)就其系统的专业知识与深厚的超专业知识

基础而言,大学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作为博学之士不等于专家,但又是专家与职业技师的母体源泉。这不仅指知识分子优秀的专业素质,而且指在专业技能与知识结构更新日趋加速的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知识分子深广的基础知识亦即原理性知识结构更新专业技术的“迁移”(transfer)能力与自我教育能力。

(2)大学原理性思维培养了知识分子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但如前所述,原理性思维与追根究源的“本体论”思维习性乃植根于终极性信仰。因而,大学知识分子理性究问的深层气质乃是对真善美终极价值的执著向往。这一境界也是大学教育最深层亦即最高的培养目标。领略此一境界的大学知识分子从而可能超越一己利益与各类特定利益的狭隘限定,而得以以区别于民族国家的“社会”最高最长远的全公共性视野思想行事。大学知识分子从而成为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公无私者。大学则不仅作为科学原理创新的基地,也成为社会道义的策源地。

上述大学知识分子的特性,可用 Michael Confino 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著名概括来表述,即深切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将公共利益视为自身之事;将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有一种义务感,不顾一切代价地追求终极结论;深信现状事物须作改变^[9]。能够如此立身行事者,即为知识分子。这当然不限于大学,但培养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是大学的天职。

四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已指出:“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这不仅指有形之规章、制度、礼仪以学校为原型,而且“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非于是于学校。”^[10]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最终根据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价值意义的,它们以教育机制为依托统一于大学。大学作为知识科学、理性与自由、公共精神的教化——策源中心,成为现代社会统一性的终极保证。因而,“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核心”(耶鲁大学“Giamatti 座椅”铭文)。然而,现代化压力却一直在迫使大学片面地服务于市场经济与全球化形势下民族国家的竞争。从纽曼时代开始,大学人文精神即被视作一种需要守持维护的理想信念(理念)。追溯大学的基督教起源

背景及其信仰渊源,有助于获得一种历史视野,以使人们更深刻地领悟历史赋予大学包容并超出经济、技术之上的信仰教化使命。一个成熟的社会与民族,应当理解那近乎精神隐修的大学人文精神支撑现代社会——不只是科学技术、而且是终极价值——的信仰意义。艾伦·布鲁姆(Allon Bloom)如此描写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学:“组成芝加哥大学的是一群仿哥特式的建筑物,……它们指向一条路,这条路通向伟人会面的地方。……这是一个最沉溺于实际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由于这些殿堂被赋予了先知与圣人的精神,因而有别于其他的处所。如果不计其精神的话,这些殿堂具有与普通房舍相同的许多功能,然而由于信仰之故,它们至今还是圣殿。一旦信仰消逝,先哲与圣人传播的经典成为无稽之谈时,即使房舍中活动不断,圣殿也不再成其为殿堂了。它会因此而走向死亡,至多成为一种纪念碑,悠闲的游客将永远不会领略它的内在生命。也许这个比较并非恰当,但是大学的讲坛的确也受到一种类同的精神的熏陶,这就是已故的先哲的精神,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分享着这种体验。先哲的精神几乎可以包容一切人,然而只有人们尊敬并且认识到它的尊严之时,才可能如此。”^[11]

但愿 21 世纪的人们还能够对那些葆存着中古神圣气质的老楼旧屋心存敬仰与想象,大学从而还会是一种理念,社会从而还会有一处理想源泉。

参考文献:

- [1] 海德格尔,世界图象的时代[A]. 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下)[C]. 上海:三联书店,1996. 894.
- [2] 尤西林. 有别于涵义(meaning)的意义(significance)[J]. 学术月刊,1996,(10).
- [3] 尤西林. 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 [4][5] 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6] 威廉·博伊德,埃德蒙·金,等. 西方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148—156.
- [7] 21 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百年校庆高等教育论坛论文集[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0—21.
- [8] Н. А. 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17—18.
- [9]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
- [10]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学校.
- [11] A·布鲁姆.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91.

(本文责任编辑 邓建生)